

鑑真研究論文集



007922



前 言

鉴真和尚（公元688—763）扬州江阳县人，俗姓淳于，是唐代的高僧。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淮南地区，佛教史籍说他“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可见他威望很高。他于天宝元年（742）受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的请求，毅然发愿东渡日本。由于当时交通的困难，以及社会上各种阻力，六次起行，五次失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天宝十二年（753）和其随行弟子一起，成功到达日本。那时他已双目失明，六十六岁了。他在日本十年，除弘传佛教外，还在汉文学、医药、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光辉人物。他于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在日本逝世。

历时一千二百多年的鉴真和尚像，是日本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被日本作为“国宝”。鉴真像来我国展览是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参观唐招提寺时，欣然答应森本孝顺（唐招提寺长老）要求的。1979年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日参观唐招提寺时，再次表示欢迎。日本大平首相访华在政协礼堂发表演讲时，对鉴真像来我国展览的意义，也作了很高评价。

凡是关心这件事的人，都想知道一下鉴真的生平。我们从刊物上选出赵朴初同志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十余篇，编印成集，在政协系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内部交流。这些论文，散见于各种刊物上，不易找到，我们把它汇集起来，省去同志们寻觅之劳。

选入的论文，包括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鉴真与扬州的关系、鉴真传记的考订以及中国佛教律宗源流五方面，按性质排列。选入的论文，以反映我国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主。没有找到新作的，则采用旧作。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删去了论文中的图版，请读者谅解。

在编印过程中，我们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赵朴初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亲笔题签，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编辑水平不高，资料搜集不足，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后补正。

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科

1980年2月

鉴真研究论文集

- 鉴真——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赵朴初 (1)
- 邀请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汪向荣 (4)
- 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卞孝萱 (20)
- 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卞孝萱 (34)
- 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梁思成 (53)
- 日本唐招提寺的建筑和造象艺术……………邓健吾 (63)
- 在鉴真塑像回国期间谈谈他医药方面的史事
……………耿鉴庭 (74)
- 唐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常任侠 (78)
- 鉴真与扬州……………卞孝萱 (85)
- 扬州大明寺考……………孙蔚民 (97)
- 中国佛教律宗源流……………杨廷福 (110)
- 唐过海和尚鉴真大师灭度一千二百年纪念献辞
……………向 达 (131)
- 《唐大和上东征传》…………… (141)
- 《唐大和上东征传》考……………汪向荣 (159)

鉴真—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

赵朴初

中日两国的文化有着脉络相通的血缘关系。千百年来，我们两国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成为并跃于世界东方的灿烂双星。为了结成中日文化的血肉因缘，我们两国祖先中的杰出人物曾作过百折不挠的奋斗，其中特别令人崇敬的是我国唐代律学高僧鉴真大师。他顺应时代的要求，毅然接受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祈请，以深远的识见，忘我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卓越的才能，冲破海风巨浪，战胜社会阻力，历尽千辛万苦，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六次东渡”，终于把高度发展的唐代文化精华（包括佛学、医药、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带到了日本国土。从此以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更加敞开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加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牢固了。今天我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这位硕学宏识、艰苦卓越的鉴真大师及其中日合作者从内心深处发出崇高的敬意。他们是中日文化血缘缔结史上的不朽人物。

一千多年来，伟大的日本人民一直怀念和崇敬鉴真大师，以此寄托他们对中国人民那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传统感情。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六三年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纪念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的盛况。这可以说是中日友好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性的大事。当时日本佛教界和文化界倡导把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一九六四年五月定为“鉴真年间”，运用各种形式展开了极为广泛热烈的纪念活动，几乎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

促进中日友好的运动。日本鉴真和尚遗德奉赞会得到日本著名雕刻家本乡新先生的协助。按照唐招提寺金堂形状作成了一种纪念章，广为发行。日本鉴真和尚纪念会也邀请本乡新依照日本国宝佛像是恩托在鉴真生前手制的坐象，仿制了一尊赠予我国。日本著名学者安藤更生写了巨著《鉴真和尚的研究》。日本现代名作家井上靖写了一部描述鉴真事迹的小说《天平之甍》。剧作家依田义贤据此改编为话剧。并由河原崎长十郎等著名戏剧家在两国首都公演。通过演出，他们把鉴真的不朽形象和一千多年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重现在人们面前，有力地唤起了两国人民传统的友好之情。记得那年五月，我作为中国佛教访日友好代表团的成员正在日本访问。一天晚上，在京都一家剧场的后台，我第一次见到了刚刚卸装的河原崎长十郎先生。彼此一见如故，紧紧握手，热烈拥抱。河原崎长十郎先生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之后，我曾诗赠河原先生追忆此事此情：“忆君十年前，绝艺演盲圣，倾倒两邦人，至情与至性。访我于京都，倾谈泪横迸。谊如连枝亲，义比同袍胜。……”

十多年过去了，那次纪念鉴真远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友有的还在继续为中日友好事业辛勤操劳，有的已与我们永别了。如龟井胜一郎先生、中岛健藏先生，但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万古常新的。当年播下友谊的种子，如今已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记得那时我们曾将扬州鉴真故居的琼花幼苗赠送给唐招提寺，经过精心培育，幼苗长成了树木。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刚到奈良，恰巧唐招提寺的琼花第一次开花了。森本长老特地剪了两枝，一枝供奉在鉴真塔前，一枝派专人送给我，正是人也有情花也有情。有情人送来了多情花。一九七九年四月，我参加人大代表团访日。又一次

来到唐招提寺，日本朋友阪本裕仁把具有不平凡经历的“日中友好莲”的藕鞭捧交邓副委员长。这种莲花的种子原为日本千叶县发现的二千年前的古莲子，由大贺一郎博士培育成“大贺莲”，于一九六三年“鉴真年间”赠送给中国；中国的植物学家又把“大贺莲”与中国古莲子培育出来的莲花进行杂交，产生了一种新品种，命名为“中日友好莲”，回赠给大贺先生的学生阪本裕二。阪本把它栽种在唐招提寺。当他知道中日友好莲受到“四人帮”破坏，在中国灭绝时，便把这“日中友好莲”还赠给我国。日本人民就是这样通过育花、赠花，表达自己对鉴真大师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令人毕生难忘。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迸发出新的活力，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日本人民依然极其崇敬曾为缔结中日文化血缘关系而渡海献身的鉴真大师。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唐招提寺的森本长老请求奉送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得到了邓副总理的面允。一九七九年四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日时，森本长老再次表达了上述愿望，邓副委员长当即表示热烈欢迎。令人高兴的是，如今的许多条件比起十多年前纪念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时好得多了。可以预料，鉴真像“回国探亲”，必将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的又一件盛事。

邀请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

汪向荣

鉴真的坐象，不久即将回国“探亲”，这将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史上的一件盛事。

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远在上古时代就开始了，就以中国史籍中有正式文字记载的而论，也远在二千年以前^①。这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哺育着日本，日本文化又反过来帮助了中国；其间有不少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代的鉴真和尚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以耄龄应邀，历尽艰辛，甚至在双目失明以后，还不改变其素衷，先后经十二年之久，终于达到其目的。鉴真一行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贡献，所起的作用是至深且钜的；而且其范围绝不局限于佛教这一方面，因此一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受到两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鉴真为什么要东渡？从《唐大和上东征传》看，知道是应日本遣唐学问僧荣睿、普照之请而到日本传戒弘法的。可是日本为什么要在佛教传入约二百年之后，还要到中国招聘传戒师呢？荣睿和普照又为什么在已经邀请了道璿赴日之后，而且又在屡遭打击的情况下，还坚持本愿，始终要请鉴真东渡呢？

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统治

要探明这一系列问题，得先从佛教在当时日本的情况谈起。

佛教是公元五五二年（日钦明天皇十三年）由百济传到日

本的②。那时候，佛教在中国不但已经昌盛，且在吸收和消化从印度传来的经疏后，已向周围国家传布了。就是朝鲜半岛上的三国，也早都有了佛教③。但无论是在朝鲜或日本，开始受容佛教时，都不仅仅是作为宗教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统治工具而传入的。这情况和传入中国时的一样，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固有势力的排挤④。在日本史籍中，也可以见到佛象被投江、佛殿被烧毁的记载⑤。再加上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都不高，对佛教这种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文化概念，其受容能力是很成问题的。因此在传入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佛教只流传于少数统治者之间。无怪后来《延历寺僧禅岑记》中说：钦明前日本的佛教是“唐人持来佛像，然而非流布也。”从今天看来，确系记实。

五世纪末，日本以氏姓制度为中心的奴隶制已面临崩溃；在奴隶主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过去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家族制度，已被破坏，大批人民，主要是农民因无法忍受掠夺和剥削而离开土地、家园，用逃亡以作消极抵抗。这样使统治阶级的奴隶主贵族们不能不考虑采用新的方式、手段，否则就无法维持其统治。佛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从精神上维持、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工具而引入的。因此在引入后长时期中，只流传于少数上层贵族奴隶主之间，和广大人民是无关的。

引进佛教以巩固统治的意义，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并不是都能认识到的，特别是一些思想上顽固保守的贵族奴隶主；有的虽然也认识到这点，甚而还积极利用过，可是由于其剥削的本质不能改变，后来慢慢地走到了反面，又被另一些贵族奴隶主利用佛教这工具来反对，打击他们。因此贯穿着日本古代历史中的崇佛排佛之争，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间争权的反映。

像苏我氏打倒和灭亡了物部氏⑥以后，他自己又被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夺了权。一系列的政争，都是以崇佛排佛方式出现的。

当时中国的文明远胜于日本，所以在政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一方，都积极向中国学习，从中国输入文化和生产技术，也从中国学习统治手段，以加强和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中间也包括有作为统治手段之一的佛教。

七世纪以后，日本已有条件直接大规模地向中国派遣人员学习。在苏我氏这个贵族奴隶主支持下执政的圣德太子，一取得政权就颁发兴佛的诏书，修建佛殿，塑造佛像，并且还一次又一次地遣使入隋。不仅以“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为其理由，而且在使团中，还选派了一批专门学习佛法的学问僧⑦。

这批到中国求法的沙门中，有些人后来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来学佛法”的沙门，也和留学生一样，为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出过很大力气，起过很大作用。有名的，同时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标志的大化革新，就是在遣隋学生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直接顾问和参与下发动、完成的；而主持革新的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又都是学问僧南渊请安的学生⑧。可以想像，佛教在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所起的作用大到怎样的程度了；也可以知道，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怎样重视和利用、掌握佛教这工具，来为他们争权和加强、巩固统治服务的了。

进入八世纪后，日本社会上的动乱，包括贵族奴隶主间的争权和人民的反抗，使大化革新之后建立起来的律令政治的基础——公地公民制，很快就陷于动摇和崩溃。这样，从中国引进高度文化，包括生产技术和统治方法，就成了当务之急。这

就是从七、八世纪开始，日本大量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的背景，也是为什么要邀请鉴真东渡的背景。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后，作为奴隶制基础的土地和人民（奴隶或半奴隶）已由私有制而改为公地公民；原来分散在各地豪族、小奴隶主手中的权力，都被集中到以天皇朝廷为代表的中央了。大和朝廷为了强化、巩固他们的统治，仿效中国，推行律令政治；律令政治的经济基础是租、庸、调，就是由中央政权直接向人民征收赋税，征调劳役。

律令政治推行以后，日本大和朝廷曾大量引进中国大陆的技术和体制，以加强其统治，但当时两国的具体条件不同，生产力也相异；因此导入中国文化的结果，徒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陷于贫穷；而由于新工具（主要是铁制农具）的使用，新技术的引进，使一部分有可能接触大陆文化的上层分子，能利用这种新技术和新工具，从事更大的掠夺和剥削，也使社会上两极分化更见剧烈。绝大多数人民，主要是农民饥寒交迫，甚而陷入连最低生活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这情况下，起而反抗是必然的。不过在当时条件下，还不可能有有组织的起义和暴动，唯一的方法，就是流浪和逃亡，离开土地。

八世纪之后，这种反抗日趋表面化，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大和朝廷不得不修改部分法令，减轻人民的负担以缓和矛盾。例如七〇六年制定七条法令，减收一半庸布^⑨；要地方官员注意农民生活，免租免课^⑩；还令各地国司抚养赈恤还乡役民^⑪。这些法令，并没有能阻止人民，尤其是农民的逃亡，更因为贵族奴隶主间的争霸，战争不断，使人民的负担反见增加。因此，大和朝廷虽三令五申地禁止流浪、逃亡，而且还禁止私自收容，一经发觉，就要“揆状科罪”^⑫。然而由于这些

贵族奴隶主的剥削本质不变，所以这些法令不但不见效，反而更进一步，连贵族奴隶主们的卫士、家奴也续有逃亡，致不能不下诏，重申服役年限，限为三年^⑬。律令政治基础的公地公民制，到这时候已完全崩溃，迫使其统治阶级不得不更进一步加紧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和再度修改法令。在这情况下，佛教的利用受到了重视。

天平以后，日本统治阶级间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留隋、留唐的学生、学问僧不但被利用，而且更进而直接参与其间；加上天灾，社会上十分混乱。这情形下，佛教不但可以起到欺骗和麻痹人民的精神作用，而且还能削弱其反抗。随着社会局势的恶化，统治阶级就更加需要佛教了。

我们看一下天平以后，佛教在日本得到发展的情况和局势间的关系：七二九年，发生“长屋王反叛”事件；七三二年，旱魃，秋收极寡；次年“诸国饥疫”^⑭；七三四年，又发生地震。七三五年以后，疫疮流行，“公卿以下天下百姓，相继没死，不可胜计。”^⑮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也就是当时掌握大和朝廷大权的藤原家族的四兄弟和握军事大权的新田部亲王，最高行政首脑的舍人亲王——死于疫。随着藤原四兄弟的死亡，另一派贵族奴隶主势力，以桔诸兄为首的贵族奴隶主，在入唐回国的吉备真备、玄昉等为代表的地方小奴隶主势力支持下掌握了朝政，排斥藤原一族，从而引起了七四〇年藤原广嗣的叛乱^⑯。在这样的大动乱中，大和朝廷到处修筑寺庙，颁送金光明经等^⑰，企图使中央，掌握了朝政的大奴隶主势力渗透到还为地方豪族小奴隶主割据着的各地，以加强中央集权。七三八年，即藤原氏一族的势力已完全被排除后，玄昉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受中央直接控制。这计划到七四一年，就是平了藤原一族最后的反抗，藤原广嗣之乱后的

一年，由朝廷下令执行⑮。七四三年，更进一步，下诏在东大寺塑造大佛，并由过去镇压过的行基法师率弟子等劝诱众庶⑯。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和加强巩固当时的统治有关的。很清楚到各地造寺，特别是国分寺、国分尼寺的造营，是以控制佛寺的方式来控制地方，以贯彻当时的统一政策，藤原广嗣的称兵反叛，可能就是由此而引起的。大佛的营造也是这政策的一环，暂时失势的藤原一族又利用了这机会，打击了以桔诸兄、吉备真备和玄昉等为代表的一派，替藤原仲麻吕的登台做好了准备，最后终于发生了桔奈良麻吕之变。

人民逃避压榨归身寺院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人民不可能得到丝毫利益，反而因天灾人祸而更深地陷于无法生活的地步。所以当时社会上的动荡不安，更见严重，逃亡和流浪遍及全国各地。当然，流浪和逃亡出去的人民还是要生活的，为了生活，他们离开了家园，不投奔剥削较轻的边鄙地区的豪族、小奴隶主，就只能归身于寺院，受僧籍奴隶主的压榨剥削，以代替沉重的凋庸负担，逃避兵役。这样，原来在城市附近的良田荒芜了，而边鄙地区不毛之地，却逐渐被开垦出来。另一个情况就是寺院的规模日见扩大，直接威胁朝廷的财政收入；更加上剃度容易，寺僧增加，服役者日少，严重地影响了大和朝廷的兵源。

原来当时的日本，也和中国一样，凡取得僧籍的都能享受免课免役的特权。在中国，虽然也发生僧籍地主和世俗地主间的争执、冲突，但因为有一套制度和手续的限制，所以为害还不小；而在日本，虽也有制度和手续，但并没有实行。中国的僧侣，必须通过受戒和度牒制度，才能取得这资格；可是在日

本，自誓就能得到社会承认，成为享受免课免役特权的僧侣。当时日本的僧侣，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自度”或“私度”的。僧籍奴隶主当然不会平白收容一批逃亡人民，只是他们的剥削，在程度上要轻于大和朝廷。这样，在被剥削得活不下去的人民（主要是农民）看来，为了生活自然会考虑和选择这一受剥削较轻而活下去的途径。因此社会上动乱愈甚，阶级矛盾愈尖锐，投身或依附于僧籍奴隶主门下的就愈多，寺院，即僧籍贵族奴隶主的势力也就日见膨胀，对世俗贵族、奴隶主的打击、损害也更大。以天皇为代表的大和朝廷一面利用佛教、僧徒渗透到各地方，控制地方豪族奴隶主，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可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到寺院势力的增大，僧徒数字的日增会破坏其利益、经济基础，从而直接影响到律令政治。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一面三令五申地要到各地造寺写经，一面又下令限制自度、私度，镇压和禁止人民为逃避课役而为僧。

七一七年（日养老元年）五月丙辰的诏书中，先说：“率土百姓，浮浪四方，规避课役，遂仕王臣，或望资人，或求得度。”又说：“僧尼取年十六已下，不输庸调者，听为童子”。^{②0}次年，又以太政官告僧纲的方式，要“凡诸僧徒，勿使浮游。”^{②1}并且禁止“任意入山，辄造庵窟，混浊山河之清，杂熏烟雾之彩。……日乞告秽杂市里，情虽逐于和光，形无别于穷乞。”^{②2}不到两年时间内，连发两次诏书，严重情况可见一斑。

从当时情况来看，固然有由于信仰而为僧的，但大多数都只是作为逃避课役的一种手段，因此对于佛教，很难说有什么信仰，有的甚至行为乖张，完全配不上称作佛徒。早在六二四年（日推古天皇三十二年）就因为有一僧人执斧毆祖父，使大和朝廷不能不在“夫道人尚犯法，何以诲俗人”理由下设立僧

纲管理^{②③}。当时，佛教传入时间还短，还能用“以僧尼未习法律，辄犯恶逆”为解^{②④}。进入八世纪以后，是不是有所改变呢？从史籍所记载的看，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善。例如七一七年四月壬辰的诏书中，不但指责自度私度，而且还指出：“貌似桑门，情挟奸盗”，“方今僧尼辄向病人之家，诈祷幻怪之情，戾执巫术，逐占吉凶，恐胁耄稚。稍致有求，道俗无别，终生奸乱^{②⑤}。”到七二二年（日养老六年）七月，又指责说：“近在京僧尼，以浅识轻智，巧说罪福之因果，不练戒律，诈诱都里之众庶，内黷圣教，外亏皇猷。”“聚宿为常，妖讹成群，初似修道，终挟奸乱。”^{②⑥}《日本灵异记》中，记有不少当时自度、私度僧的情况。如上十九话中说，一个自度沙弥常以下棋度日；上二十七话中记河内国石川郡石川沙弥，“虽容假沙门，而心系贱盗：或诈称造塔，敛人钱财；或斫寺中灯柱，污法诬人，莫此为甚。”这些僧侣品质低下的情况，其统治者是很清楚的。早在七一三年（日和铜六年），其近江守藤原武智麻吕的奏报管下寺院情况时，就说过：“寺家徒贪财物，不修法事。”僧徒的腐败情况，溢于言表。

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大和朝廷为了保护其本身的利益，不致动摇其经济基础，并能充分利用控制佛教这工具起见，曾不断制定法令正肃僧徒纪律，限制他们发展。如发公验^{②⑦}限制得度人数^{②⑧}，规定唱经转礼，必须用唐音^{②⑨}和学行程度^{③⑩}；对寺院的兼并土地，也明令禁止^{③⑪}，以防止任意剃度为僧和寺院的不断扩大。免得以调赋收入为主的经济基础和服役正丁数的受影响，从而巩固其政权。

但是，这些措施也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因为在当时，日本的生产力和中国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完全照搬中国那套格式制度，很难行得通。就以唱经转礼都得依唐音，才能得度一事

而论，在当时的日本，究竟有几个净行僧具有能证明其读经、诵经和诵咒三者确依唐音的条件呢？再加社会动乱日见加深，而贵族奴隶主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日甚一日，自度、私度是无从禁止、无法限制的。此路不通，使大和朝廷不能不改弦易辙。对行基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说明。

行基，后人称为行基菩萨，是天智天皇时人，后来活跃在天武、持统、文武、元明甚至圣武各朝。他本人大概也是一个自度或私度僧^②。对于当时大和朝廷的佛教政策，显然是有很大抵触的。他把人民作为传教的对象，而不局限于贵族奴隶主身上；由于他在传教活动中，曾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福利事业，因此受到人民的拥护^③。可是，他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某些地方，如自度私度僧的增多等，还严重违反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在七一七年（日养老元年）四月，大和朝廷下令镇压禁止行基的传教活动。说：“零叠街衢，妄说罪福，合构朋党，焚剥指臂。历门假说，强乞余物，诈称圣道，妖惑百姓，道俗扰乱，四民弃业”^④。后来，又采取了一系列禁止僧徒浮浪寺外、造私庵、乞食市里^⑤；严禁私自出家，到市井乞食宣教等^⑥。同时加强了僧纲制，调查僧尼名籍^⑦等措施，企图限制和削弱行基等的活动，而由朝廷来加以控制。

统治者从佛教内部进行控制

但是行基的传教活动有它的群众基础，不是一纸命令所能改变的。何况当时不堪忍受贵族奴隶主剥削的人民，其所以投身僧籍，除了在经济上企图减轻负担外，也希望在精神上有所寄托。这样，行基的活动，并没有因朝廷的压迫、限制而削